

# 非国有经济发展 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影响机理研究

——来自 VEC 模型的新证据

□ 刘海英 张纯洪

(吉林大学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12)

转轨以来, 中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的数量扩张。这是因为, 经济非国有化改革作为一种制度创新, 是一种增量式改革。这种改革使得体制内利益在未受影响的条件下, 实现了帕雷托式的增长。然而,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比改善。这是因为, 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一般都过分强调以利润为中心, 忽略环境成本, 并且由于融资困难等因素导致了其技术创新能力的弱化; 其次, 中国引进的外资不仅在技术和管理创新的扩散效应上没能达到预期效果, 而且日益增加的加工贸易通过转移定价方式使中国经济不能充分享有出口增长带来的利润贡献。

**关键词:** 经济增长; 非国有经济; 增长质量, 影响机理

**中图分类号:** F0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656(2007)06—0063—08

## 一、引言

国内外关于非国有经济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存在着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中国国有经济部分效率低下, 而非国有经济部分 (Nonstate Sector) 的效率相对较高。比如 Lin<sup>[1]223</sup> 的研究发现, 1978 年以来, 国有企业 (SOEs) 的盈利能力持续下降。Jefferson, Rawski & Zheng<sup>[2]178</sup>、Jefferson, Rawski, Wang & Zheng<sup>[3]809</sup>、Laurenceson & Chai<sup>[4]38</sup>、McCall & Wang<sup>[5]448</sup>、Zhang, Zhang & Zhao<sup>[6]340</sup>、Carsten<sup>[7]526</sup> 以及 Zhang, Zhang & Zhao<sup>[8]86</sup> 等通过对比 SOEs 和非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利润率后得出, 后者具有更好的盈利能力和更高的效率, 并且在统计意义上得出, 管理激励因素导致了非国有化经济的效率较高。Wei, Varela & Hassan<sup>[9]76</sup> 的研究扩大了样本范围, 选取了中国 1036 家不同所有制企业做绩效差异评估, 得出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低于非国有企业<sup>①</sup>。而 Phillips & Shen<sup>[10]1098</sup> 则从宏观角度研究非国有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包含了国有经济份额等因素的回归模型中, 发现国企比重和区域经济增长率呈强的负相关, 国有经济所占份额下降 10 个百分点, 第二年的实际 GDP 增长 0.7%—1.2%。

<sup>①</sup> 该文作者虽然将中国集体所有制企业也纳入到了非国有企业范畴, 但这种界定并不影响其研究结论。

相反的观点却认为,非国有经济发展并没有明显提高中国的经济效率。比如 Dollar<sup>[11][103]</sup>、Gordon & Li<sup>[12][25]</sup>、Stiglitz<sup>[13][336]</sup>、Carsten<sup>[7][520]</sup> 以及 Aivazian, Ge & Qiu<sup>[14][802]</sup> 等国外学者的经验研究表明,中国非国有化改革并不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必要前提。丁冰<sup>[15][56]</sup>、张克难<sup>[16][16]</sup> 和刘元春<sup>[17][80]</sup> 等学者研究认为,宏观效率与微观效率并不一致,简单的资本非国有化改革在过去有弱化我国规模经济以及资本产出效率的作用。

综上可以看出,国内外关于中国非国有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基本上围绕非国有化改革效应展开的,或者将中国非国有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制度变量,研究其对微观企业效率或宏观经济增长(GDP)的促进作用。然而,高质量经济增长本身体现了经济数量扩张与质量提高的有机统一,经济效率并不等同于增长质量。基于此,本文将从宏观角度,基于动态计量检验的方法,研究非国有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影响的不同机理。

## 二、非国有经济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 VEC<sup>①</sup>模型系统

### (一)模型变量设定

VAR 模型系统需要三个表征中国非国有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质量的变量序列。其中,反映非国有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用历年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经济的百分比 F 来表征;反映经济增长数量的变量用按 1978 年不变价(1978 = 1)计算的历年经济增长指数 Y 来表征,这两个指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及相关计算<sup>②</sup>;而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变量,则用转轨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的因子得分值 Q 来表征<sup>③</sup>。

根据变量平稳性条件,最终选择序列 Q、LF(F 对数化)的一阶差分序列 D(LF)和 LY(Y 对数化)的一阶差分序列 D(LY)作为 VAR 系统的三个内生变量,分别代表转轨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非国有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数量变化的三个指标。<sup>④</sup>

### (二)基于多变量协整关系的 VEC 模型建立

依据 AIC 和 SC 信息量最小的准则确定模型的阶数。然后按照 Johansen<sup>[3][121]</sup> 提出的关于压缩(系数)矩阵  $\Pi$  协整似然比(LR)的检验方法进行检验。原假设至多有  $\gamma$  个协整关系,根据系统内序列走势确定有线性趋势并且协整方程有截距这一选项,运用最大特征值和特征值轨迹两种方法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①由于文章篇幅所限,本文将关于 VAR—VEC 建模的一些理论阐述略去,需要者可向作者索取。

②中国经济的非国有化变量指标本来应该用历年 GDP 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来替代,但中国现有的统计体系中没有对非国有经济创造的 GDP 进行测算,而只有非国有的工业企业总产值指标,而且非国有化程度虽然可以用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例来度量,但 1999 年以后由于中国的工业总产值数据仅公布规模(500 万)以上企业的数字,规模以下的工业总产值数据由国家统计局通过抽样每季度进行统计,但并不公开具体数据。因此规模以下的工业总产值数据无法直接获得,本文采用 2004 年度国家调查后公开的规模(500 万)以下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值指标比重作为加权测算的依据,并据此测算 1999—2004 年中国经济的非国有化水平。

③系本人前期研究成果,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经济科学》2006 年第 2 期中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和规模扩张的非一致性实证研究》一文。其中用 17 个反映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指标建立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体系,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转轨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做出综合评价。

④因篇幅所限,最终的检验和选择过程略去。

表 1 多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报告

原假设	特征值	特征值轨迹统计量	临界值	最大特征值统计量	临界值
一个协整关系也不存在	0.611361	31.98888*	29.79707	23.62759*	21.13162
至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0.284196	8.361294	15.49471	8.358737	14.26460
至多存在两个协整关系	0.000102	0.002557	3.841466	0.002557	3.841466

检验表明,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VAR 系统中的变量间仅存在着一个协整关系,不存在过渡识别问题,因此不需要施加经验约束。在此基础上协整方程的标准化系数及其估计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协整方程及其系数估计

	Q	D(LF)	D(LY)	C
协整系数估计值	1.000000	24.13178	-48.80786	3.307862
系数估计的渐进标准误差		(3.82312)	(10.6987)	
T-统计量		[6.31207**]	[-4.56204**]	
似然比		104.8064		

进一步令协整方程等于,即:

$$\begin{aligned} \text{VECM} = & Q + \\ & 24.13178D(LF) - \\ & 48.80786D(LY) + \\ & 3.307862 \end{aligned} \quad (1)$$

对其进行 ADF 和 KPSS 平稳性检验,发现在 1% 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了序列的平稳性,进一步验证了所建立的 VAR 系统中变量间协整关系的正确性。至此,基于多变量协整关系的 VEC 模型见(2)式:

$$\begin{bmatrix} D(Q)_t \\ D(LF,2)_t \\ D(LY,2)_t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0.010654 \\ -0.048181^{**} \\ -0.001856 \end{bmatrix} * \text{VECM}_{t-1} + \begin{bmatrix} 0.058800 \\ 0.002847 \\ 0.000847 \end{bmatrix} \quad (2)$$

其中,

$$D(Q)_t = Q_t - Q_{t-1} \quad (a)$$

$$D(LF,2)_t = D(D(LF))_t = (LF_t - LF_{t-1}) - (LF_{t-1} - LF_{t-2}) = LF_t + LF_{t-2} \quad (b)$$

$$D(LY,2)_t = D(D(LY))_t = (LY_t - LY_{t-1}) - (LY_{t-1} - LY_{t-2}) = LY_t + LY_{t-2} \quad (c)$$

将(a)(b)(c)代入(2)式,最终建立 VEC 模型系统,如(3)式所示。

$$\begin{bmatrix} Q_t - Q_{t-1} \\ LF_t + LF_{t-2} \\ LY_t + LY_{t-2}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0.010654 \\ -0.048181^{**} \\ -0.001856 \end{bmatrix} * \text{VECM}_{t-1} + \begin{bmatrix} 0.058800 \\ 0.002847 \\ 0.000847 \end{bmatrix} \quad (3)$$

另外,观察所建立的 VEC 模型调整参数矩阵  $\alpha$  的各个元素: $\alpha_{11} > 0$ ,虽然不满足 Wichens<sup>[18]268</sup> 提出的 VEC 模型所具有的负反馈机制,但应该看到, $\alpha_{11}$  的系数估计并不显著,因此模型不受其影响;同样  $\alpha_{31}$  的系数估计也不显著;只有  $\alpha_{21} = -0.048181^{**} < 0$ ,其系数估计显著,这说明中国非国有经济发展变化偏离长期均衡关系时,其负反馈机制调整产生效果。

### 三、相关检验及实证研究结论

将(1)式移项就可得到三者之间长期均衡的协整方程(4)。

$$Q = -24.13178D(LF) + 48.80786D(LY) - 3.307862 \quad (4)$$

变量 Q 与 LF 之间的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不能给出二者之间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因果关系,

即使勉强承认中国非国有经济发展 LF 是经济增长质量 Q 的 Granger 成因,犯第一类错误(弃真)的概率还是超过了 10%。因此该检验无法给出中国非国有经济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改善的有利佐证。

根据 D. F. Hendry, 秦朵<sup>[19] 399</sup>中所述的理论推知,对变量的弱外生性检验等同于变量之间的长期因果关系检验。对协整方程中的变量 D(LF)作弱外生性检验,即对原假设  $H_0: \alpha_{21} = 0$  (变量 2 相对于关注参数是弱外生性变量)进行似然比(LR)检验。检验卡方统计量和对应的 P 值分别为:  $\chi^2 = 14.80935$ ,  $P = 0.000119$ ,拒绝了 D(LF)对于其关注参数的弱外生性,也就是说,协整方程的弱外生性检验表明,存在着 D(LF)到 Q 的负向因果关系。可以证明,中国非国有经济进一步发展,抑制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同理,对协整方程中另一个变量 D(LY)作相同检验,  $H_0: \alpha_{31} = 0$ , 检验卡方统计量和对应的 P 值分别为:  $\chi^2 = 0.196193$ ,  $P = 0.657812$ , 显然接受 D(LY)为其相对关注参数的弱外生性变量,即不存在着 D(LY)到 Q 的因果关系。同时,表 2 中协整方程的系数估计显示,变量 D(LF)和 D(LY)的系数估计都在 1% 水平显著。其中 D(LF)的估计系数为负,这说明转轨以来中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经济增长质量的下降;而 D(LY)的估计系数虽然为正,但弱外生性检验的结果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数量扩张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在统计意义上无因果联系,即转轨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并没能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比改善。另外,改变系统内的变量次序为 D(LY)、D(LF)和 Q,重新建立 VEC 系统,重复上述检验过程。结果表明,存在着 D(LF)到 D(LY)的正向因果关系,即中国非国有经济发展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规模)的扩张。

基于 VEC 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非国有经济发展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规模)的扩张,但却抑制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最终表现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并没能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比改善。

#### 四、非国有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反向作用机理

##### (一)非国有经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数量扩张的机制

从经济制度供给上看,中国经济通过所有制结构的不断创新,促进了产权制度创新,产权制度创新又促进了产业结构及企业组织的变化,从而促成了市场制度、企业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变迁,活跃了经济系统内部的增长机制,使要素效率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提升了经济的内在效率,实现了经济帕雷托式的“增量”增长,最终使得经济规模不断增长。

从微观企业上看,中国经济非国有化进程体现了国有企业产出比重的相对下降和非国有企业比重的不断上升。一般来说,国有企业存在产权模糊、委托代理过程复杂(压力传导机制不畅)、缺乏对内部人的有效监督等问题。相比较而言,非国有企业的产权更加明晰,大幅度减少了代理成本和内部人控制等问题。这些因素使得非国有企业效率相对较高,具有更强的盈利能力,而企业盈利则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而这正是非国有经济发展促进经济规模扩张的微观机理。

##### (二)非国有经济抑制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改善的原因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包含了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因素、技术进步的效率因素和资本投入的成本因素。即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能只考虑量的积累,还要重视投入或产出的效率因素以及所付出的环境成本。中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根源在于微观层次上的非国有企业经营行为所导致。中国非国有企业主要包括内资民营企业 and 具有外资背景的企业(包括合资和独资,

以下简称外企),下面分别着重进行分析。

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没能带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主要原因有两点:

首先,中国民营企业相对低水平的创新能力,导致了其对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贡献率不高。由于在融资上不如国有企业,在政策上又劣于有外资背景的企业,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能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资本的缺乏导致其不愿将有限的资本投入到高风险的高新技术产业,因而通常会选择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另外,内部激励机制的缺乏、僵化的一元化产权模式以及无法彻底根除的家族化管理模式,使得中国民营企业的管理创新能力弱化。例如,珠三角、长三角一带曾经是中国民营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然而目前,如果排除掉有国企转制背景的民营企业,其中大多数民营企业因缺乏创新机制而丧失了持续增长的能力,已经或正在退出市场。这种创新能力不足注定了民营企业不大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由“广义技术进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导致的高质量经济增长。

其次,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多数是以破坏资源环境为代价的。不可否认转轨以来中国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但由于一些政策失误和有效监管的缺失,中国民营企业在无社会责任约束前提下,坚持利润至上为其唯一诉求。在企业经营实践中,大多主张“先发展后规范”的思路,甚至采取不正当的经济手段违法经营以求暴利,私自开采使用国家的有限资源,偷排偷放污染物等等。虽然企业自身成长壮大了,但从整个经济和社会环境来看,这种行为不仅加重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且加速了资源的枯竭。单从这一点看,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确实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中环境因子的改善。

和民营企业一样,转轨以来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也不可忽视。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外资企业在“利益最大化”和“税收最小化”的目标驱使下,并没有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预期的效果。主要体现在:

首先,外资企业的技术和管理创新的扩散效应不明显。

中国吸引外资企业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高新技术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为此,中国引进外资时给予了其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希望能通过“市场换技术”等手段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内涵型增长。然而,外企所看重的是中国的税收优惠和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不尽完善的自然资源 and 环境保护等相关法规,而绝不是将先进技术移植到中国培养自己的竞争对手。即使其投资了一部分高科技产业,但由于其严格保守核心技术,导致其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溢出效应并不明显。于俊艳<sup>[20]34</sup>的实证研究表明,FDI 为了维持技术上的垄断地位提高了新技术进入的成本,使中国的技术被锁定在低水平的陷阱中。因此可以说,外企并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预期的技术进步效应。另外,从产业分布可以看出,FDI 对外输出的项目很多都具有高能耗、高污染特性,这又增加了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

同样,外企所带来的管理知识溢出效应也不明显。袁诚、陆挺<sup>[21]72</sup>从民营企业家的外企经历这一视角对 FDI 管理知识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三资”企业的工作经历会带给民营企业家某些,而不是全面的先进管理理念;在企业业绩的最终表现上,FDI 对中国企业家有一定的培训效果,但并不显著。刘海英等<sup>[22]19</sup>研究表明,由人力资本分配不均所导致的人力资本存量积累不足,是导致中国“市场换技术”不成功的重要原因。赖明勇等<sup>[23]44, [24]104</sup>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积累作为对新技术的吸收能力,是技术外溢的最主要因素。这已经充分说明,引进外资企业并没有达到技术和管理创新扩散的预期效果。

其次,加工贸易中的转移定价所导致的税收流失日趋严重。

2004年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就已经达到55.3%,其中绝大部分为具有外资背景的企业。从表面上看,加工贸易出口繁荣了中国经济,但是在加工贸易过程中,外资企业完全掌握市场和渠道,严密控制关键技术,把技术和产品的开发能力大多留在国外,中方只进行简单的加工装配环节。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利用公司内部的关联交易,不仅加工所需的上游原材料直接进口,对国内原材料产业并没有形成有效需求,而且大多通过转移定价方式将利润转移到国外子公司,使政府的税收出现大量流失。可见,虽然外资企业通过大量出口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其对内不能通过有效需求促进中国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对外由于不能获得利润而使中国经济因税收流失而加大了经济增长成本。因此,外资企业通过这种“大进大出”加工贸易经济模式,给中国带来了巨额的贸易顺差,表面上看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但无论从其所带动的技术进步还是从其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利润来考察,外资企业确实阻碍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

### 五、研究启示及措施

本文的结论是通过宏观历史数据的统计推断得出,这里需要注意两个问题。首先,本文对转轨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指标的涵盖范围可能不够全面(比如缺少反映就业和经济运行状况的指标),如果能够获得更大范围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未必如此。其次,经济增长数量扩张是质量改善的物质基础,因此,不能直接否定中国非国有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且,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不佳的原因是复杂的,并非全都是非国有企业发展造成的,国有企业也难辞其咎。由于一些市场规则和法律道德规范的缺失,国有企业“费用最大化”的经营模式导致了过高的成本和低效;民营企业创新不足、缺乏社会责任;外资企业不断制造着“亏损”经营。正是由于这些复杂的原因综合,才使得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在经济规模扩张的同时没能得到同比改善。

因此,在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着重加强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具体措施如下:

首先,提高内资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引起了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戒备,因此其经济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必将受到遏制。目前中国很难再依靠国际资本输出的先进技术来获得跨越式发展,因此,中国必须进一步加大研究开发的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实现由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战略性转变。中国经济目前还没有真正建立起自主创新的平台,从短期看,这不仅降低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而且从长期来看,由于没能真正做到“经济自主”<sup>①</sup>,这将导致经济增长潜力不足。

其次,建立公平市场竞争秩序,取消外资的政策性优惠。鉴于近年来中国FDI不再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政府应当取消对外资经济的一些优惠政策,通过公平竞争促使外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中“挤出”先进的管理经验或核心技术,并通过教育培训投入,提高本地管理者对外来先进管理方法的学习能力。

再次,坚决贯彻中国政府提出的节能减排发展经济的方针。高质量、可持续经济增长是和谐发展的物质和实践基础。近年公布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单位产值能耗和两个主要污染物的指标与去年同期相

<sup>①</sup>这里的“经济自主”是指经济系统不强调依靠外部技术引进,而主要依靠经济系统自身的技术创新机制建立起来的内涵型增长方式。

比不降反升<sup>①</sup>。单单从这个指标看,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不仅没能得到改善,还有进一步下降趋势。中国经济增长所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必须纳入法定的统计体系,坚决取缔那些高消耗、高污染和以掠夺性开发为主的经济增长点,尽快扭转中国粗放型、低质量的经济增长状态。

#### 参考文献:

- [1] LIN J Y F. State Intervention, Ownership and State 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a[C].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3rd 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Taipei, 1996.
- [2] JEFFERSON G H, RAWSKI T G & ZHENG Y. Chinese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Trends, Measurement Issues, and Recent Developments[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6, 23: 146 – 180.
- [3] JEFFERSON G H, RAWSKI T G, WANG L & ZHENG Y. Ownership, Productivity Change,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in Chinese Industry[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0, 28: 786 – 813.
- [4] LAURENCESON J & CHAI J C H.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China's State – 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0, 9: 21 – 39.
- [5] CHANG C, MCCALL B & WANG Y. Incentive Contracting Versus Ownership Reforms: Evidence from China's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Working Paper). Carlso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000.
- [6] ZHANG A, ZHANG Y & ZHAO R. Impact of Ownership and Competition on the Productivity of Chinese Enterprises[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1, 29: 327 – 346.
- [7] CARSTEN A H. Long live China's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Deflating the Myth of Poor Financial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2, 13: 493 – 529.
- [8] ZHANG, A, ZHANG Y & ZHAO, R. Profitability and Productivity of Chinese Industrial Firms Measurement and Ownership Implications[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2, 13: 65 – 88.
- [9] WEI Z, VARELA O & HASSAN M K. Ownership and Performance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J]. *Journal of Multi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2002, 12: 61 – 78.
- [10] PHILLIPS K L & SHEN K. What Effect does the Size of the State – owned sector Have on Regional Growth in China? [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5, 15: 1079 – 1102.
- [11] DOLLAR D. Economic Reform and Allocative Efficiency in China's State – owned Industry[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0, 39(1), 89 – 105.
- [12] GORDON R H & LI W. The Change in Productivity of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s, 1983 – 1987[J].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1995, 6(1): 5 – 26.
- [13] STIGLITZ J E. *Whither Socialism?*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4.
- [14] AIVAZIAN V A, GE Y & QIU J. Can Corporatization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even without Privatization? [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05, 11: 791 – 808.
- [15] 丁冰. “非国有化”改革观试析[J]. *学术月刊*, 1996, (10): 50 – 58.
- [16] 张克难. “退出论”质疑[J]. *学术月刊*, 1997, (10): 15 – 17.
- [17] 刘元春. 国有企业宏观效率论——理论及其验证[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 (5): 69 – 81.
- [18] WICKENS, R. W. Interpreting Cointegration Vectors and Commonstochastic Trend[J].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6, 74: 255 – 271.

①具体参见毛磊, 杜文娟. 聚焦环保三大热点[N]. *人民日报*, 2006—08—27.

- [19] D F HENDRY. 动态经济计量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 [20] 于俊艳. FDI 的技术外溢性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J]. 生态经济,2005,(10):31-34.
- [21] 袁诚,陆挺. 外商直接投资与管理知识溢出效应:来自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证据[J]. 经济研究,2005,(3):69-73.
- [22] 刘海英,赵英才,张纯洪. 人力资本“均化”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关系研究[J]. 管理世界,2004,(11):19.
- [23] 赖明勇,张新,彭水军,包群. 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研究开发与技术外溢[J]. 中国社会科学,2005,(2):32-46.
- [24] 赖明勇,张新,彭水军,包群. 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外溢:给予吸收能力的研究[J]. 经济研究,2005,(8):95-105.

(收稿日期:2007—03—05 责任编辑:李俭国)

**Mechanism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onstate sector  
on the quality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new evidence from VEC Model**

**Liu Haiying, Zhang Chunhong**

(Quantitative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Abstract:** Since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onstate sector has encouraged the quantitative expansion of economic growth. As a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e economic privatization reform takes the form of increment. The reform has brought about the Pareto growth without the erosion of any interests inside the system.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onstate sector has never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proportionally, which can be attributed to two types of phenomena. First, during the growth process, 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s excessively focus on profits while neglecting the cost of environment. Several factors, such as financing disability, weaken thei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city. Second, we fail to achieve the expectation effects brought about by foreign capital in technology as well as in management innovation. The increasing processing trade, through transfer pricing, disables China's economy to be benefited from the profit contribution by export growth sufficiently.

**Keywords:** Economic growth, Nonstate Economy, Growth quality, Influential mechanism